

【文化转型

与

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研究

王海燕 著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FORM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作者介绍

王海燕：女，1972年出生于无锡。1995年获苏州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98年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2004年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现在苏州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著有《教育理论精讲》、《教师口语论》等书，发表有《论“多元解读”的“陷阱”》、《试论教育研究的“文化意识”》等学术论文十余篇。先后承担省级课题“当代语文教学思想史论”、国家重点课题“主体教育视野下课堂教学改革的深化研究”子课题“‘文化转型中的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等科研任务。

序 言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方汉文

王海燕博士自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以博士后身份入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余游。

年来门下士渐夥，来自苏沪宁浙及至闽粤各地大庠，中亦不乏巾幗英才，或抱荆山之玉，或握灵蛇之珠，取舍万殊，海燕处其中，娴静文雅，深孚众望。越三年，海燕以所撰博士后报告《“文化转型与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研究——关于人文精神的考察》示余，嘱以为序。余阅之，推案，击节，赞曰：

余所未言者，已先言之；余所欲言者，正在其中矣；余已言者，再申其旨。美哉，故余引为嚆矢，何敢辞焉？何敢让焉！

夫教育(Education)一词实为舶来，西方之教育自地中海文明之古代希腊开始，早在智者学派所成立的学校中，已经开始讲授辩论术、修辞学与文法。其学生大约是十五六岁的青少年，一般进行3~4年的学习。主要修习课程为文法、逻辑与修辞，还讲授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据记载，伊索克拉底于公元前392年创办了修辞学校，讲授内容增加了文学、历史、哲学与法律等。5年之后，柏拉图的著名学园阿卡德米(Academy)成立，这是整个西方高等教育的开端，学校所开课程包括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哲学等课程，柏拉图提出了西方早期的教育思想，目的是培养学生通过学习来掌握永恒的理念世界，并不是只教授知识与技术。学园延续达900年之久，“阿卡德米”一词的词义，为古代与现代西方语言

中的“学术”与“研究院”，一直沿用至今。

公元前 334 年，曾经在柏拉图学园里学习过的亚里士多德创办著名学园“吕开昂”，此外如伊壁鸠鲁学园、芝诺学园等纷纷成立，雅典古代高等教育自此开始，其风习荼靡西方世界。

我国之教育从孔子开始，孔子开私学，以五经六艺授众，庄子曾不无讥讽地说：丘治五经，自以为长久。然而不幸言中，中国私塾教育竟然延续数千年，20 世纪初期，稍偏远一些的乡村，拖着长辫子的塾师仍然是当地一种重要的人物类型。无庸讳言，从家塾到新式学校的建立，当为乡村教育之一大革命，余曾祖父原本就是一位乡村塾师，及祖父建立当地第一所新式小学，余父以省师范学生身份而就任小学第一任校长，时年十八岁，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皖北农村。“文化大革命”后，余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参观京师大学堂旧址，回忆中国教育之历史，时而惊悚，时而悲哀，竟不能自己，数日内心境不平。

教育者，立国之本也，文化者，民族之魂兮。欲强一国，必先从一国之教育始，正是在黑暗的欧洲中世纪，欧洲大学开始出现，成为文艺复兴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最早成立的是 11 世纪的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与萨来诺大学，12 世纪法国巴黎大学成立。这是欧洲最早的三所大学，故称欧洲大学之母。

具有医学背景的是萨莱诺大学，它大约成立于 1099 年，位于意大利南方名城那不勒斯附近的萨莱诺(Salerno)地方，这里是著名的疗养地，古代就已经建立了医学学校，为当地的疗养与医疗服务。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斯(Hippocrates，公元前 460—公元前 375 年)等人的医学很早就传播到了这里，成为医学教育的内容。11 世纪初期，犹太医学家阿非利加诺(Constaninus Africanus)在这里行医与著书立说，传播医术，使这里成为著名的医学中心。众多的青年医生到这里的医学学校学习，他们创立了正规的学习方式，缴纳学费。1231 年，政府正式批准为大学。

另外一所早期大学为波洛尼亚大学，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波洛

尼亚。这里商业发达,经常发生商业诉讼,法律学校相当著名。由于中世纪的大量法学家们聚集于此,进行研究与讲学,他们对于罗马法进入深入研究,发展了民法,汇编法典。公元1158年,弗里德里克一世(Frederic Barbarosca)正式颁布法令,将法律学校改为波洛尼亚大学。从此,这里成为中世纪学术研究的重镇,到14世纪中期,已经成为了拥有法学、神学、医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大学。著名诗人彼特拉克、卡尔·帕斯克里、戏剧家哥尔多尼、诗人但丁与塔索、天文学家哥白尼、发明了无线电的科学家马可尼、解剖学家马尔皮基等一大批科学文化杰出人才都出自这里。去岁与乐黛云教授言及世界最早的大学,谈及此大学时,乐先生言曾与汤一介先生共同应邀出席该大学校庆仪式,推算起来应是该校成立800周年的校庆,此实乃中西学术交往史上的佳话也。

巴黎大学,其前身是诺丹(Notre Dame,巴黎圣母院)教堂的学校,成立于12世纪初期。1180年,刚成立的巴黎大学与市民之间发生冲突,法国国王路易7世(Louis VII)看到了大学所具有的政治潜力,公开宣布承认巴黎大学,争取大学对于王权的支持。以后,法国国王菲力浦·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与大学对立,大学又取得了教皇西勒丁三世(Celestine III)所给予的特权。公元1231年,罗马教皇正式下令肯定大学自决权,欧洲大学与教会,为社会具有独立权力的机构,这在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从公元13世纪末期起,巴黎大学文学院院长当上了大学校长,学者掌握了学校的领导权。当时学校设文学、神学、法学和医学4大学院,学生最多时达到4万多人,时为欧洲最大的大学。

在这三所大学影响之下,西欧各国纷纷成立大学。公元1168年,英国牛津(Oxford)大学成立,1209年剑桥(Cambridge)大学从牛津大学中分出,成为一所独立大学。1222年意大利帕多瓦(Padova)大学成立,1224年那不勒斯(Napoli)大学成立,1355年亚勒索(Arezzo)大学成立。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西班牙帕伦西亚大学、萨拉曼卡大学,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创立图卢兹大学、蒙彼利

尔大学。13 世纪之后,布拉格大学、维也纳大学、爱尔福特大学、海德堡大学、科隆大学等纷纷成立。到 1600 年,全欧洲共有 105 所大学,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欧洲大学,此时基本已经全部成立。

英语中的大学 University 来自于拉丁文 Universitas,本是“行会”与“组织”的意思。来源于中世纪各行业的行会和专业团体。中世纪大学最早名为“教师与学生的组织”(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由于大学是专业团体,所研究的文学、法学、神学与医学等都有相当普遍的社会性,学校机构庞大,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所以与教会、俗世政权和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终发展为具有独立学术权力与自决权力的机构。大学的历史上多次发生过与社会各阶层的冲突,导致学校的分校、迁校等行动。

西方重视科学,故中世纪大学的基本单位是学院,最早的学院并不是按专业划分的,后起的大学按专业划分了学院,其中文学院一般是基础教育,神学、法学、医学属于较高的专业教育。大学里已经建立了规范的学位制度。最初级的学位学士(Bachelor)原本是一种学历证明,说明已经获得了可以从事教授的资格,以后逐渐发展为独立学位。硕士(Master)与博士(Doctor)原来只是同一级别的学位,但是考试与颁发学位的方式不同。以后发展成为不同级别的学位。学位申请者都要经过两种考试:个人考试与公开答辩,答辩之后,答辩委员会经过表决,申请者才可能获得学位。

中世纪大学是欧洲文化中一种重要现象,一方面它表现了基督教力量的强大,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不同程度受到教会控制,有的大学成了教会的工具。另一方面,中世纪大学在争取学术独立与自由方面又有独特的贡献,大学特权与自决权是重要表现。相当多的大学有自决权,即有权力设立法庭,校外人员与大学生发生争议,由大学进行审理。这是其他社会阶层所不能享有的权利,大学师生可以免服兵役与享受免赋税的特权。1385 年,洛伯特一世(Rupert I)宣布,海德堡大学师生,包括学校相关人员,可

以免除各种赋税。大学有权颁发专业证书与特许证(Charters),持大学证书都可以在各地任职任教,发证人原为教会,以后经过教师据理力争,相当多的大学改为教师。相当多的大学规定大学教授执教一定年限可获得爵位。牛津、剑桥、巴黎、苏格兰等大学还在国会中有自己的席位;以上这些规定,都反映出当时大学的特殊地位。正因为如此,大学里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杰出的学者如伽里略、加尔文、弗朗西斯·培根与牛顿等人,都与大学有直接关系,欧洲科学、思想与艺术的发展,欧洲文化的进步,都与大学密不可分。

何为文化?

本书中王海燕博士已有详尽论述,余欲再申其说。

2005年台湾佛光大学黄维樑教授在一篇论文中谈到拙作《比较文化学》一书中关于“文化”的定义探讨,大意是说,对于现有的文化定义作了详尽的说明。余今日重阅旧文,愿将其中关于文化的定义再引如下。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先简化式地把文化表示为:

民族精神与思维模式——语言符号系统、社会关系——社会生产与个体行为方式

这其实是三种不同层次的结构,民族精神与思维方式是意识形态的层次,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构成。可以说是文化的内在要求,是文化的心理与意识层次,当然,这种文化层次不是凭空形成的,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实践中形成的。可以说,这就是“化”字的含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谓之化”,第二个层次是人类活动的语言和社会关系,属于社会生活的上层。第三个层次是社会生产与个体行为方式,是人类活动的最基本层次。我们也可以把它看做是“文”字的最贴切解释。《易·系辞》曰:

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

在比较文化学中,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地位并不完全一样,因为比较文化学主要是研究作为整体性的文化类型,所以,它最

主要的研究层次是象征意义最为突出的民族精神,民族的心理素质,民族的思维方式这一层次的特征。但是,这一层次与民族的语言、风俗又是融合为一的。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比较研究,这个整体的核心是民族精神与思维特征。

这样,比较文化学的研究与其他研究就不重合,比如,对于不同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是比较语言学的任务,对于不同宗教的比较是比较宗教学,对于不同风俗的比较是比较民俗学的工作等。

这样我们可以把文化简单总结一下。所谓文化,首先是文化的总体意义,是人的内在要求与外部世界互相作用的方式,是人类精神与物质活动的总称。所以它是内外结合的。其次,作为具体的文化因素,它包括人的精神活动如心理和意识的活动,也包括人类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还有具体的生活方式,这都是文化的内容,也就是说,文化是构成人类精神与物质活动的具体因素。它不等同于具体的活动,如物质的商品生产、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活动等,但又存在于它们的每一种具体方式之中。这也就是我们可以从每一件商品中,如中国出产的茶叶与丝绸、美国的可口可乐等,每一种艺术形式中,如中国的京剧与昆曲,意大利的歌剧,欧洲的油画等,都可以看出特有的民族文化精神的表现。所以,我们既不能把文化无限扩大化,一切都称之为文化,同时也不能把文化与具体的行为方式或某一物品相等同。这样,我们在理解“文化”这一概念时,也要避免千篇一律地把它简化为“一切精神与物质产品的总合”之类的说法。当然,正像我们上文所说,并非这种定义是错误的,而是在比较文化研究中,我们要有更为精确的文化概念。^①

不过必须说明,近年来出现一种“文化泛滥”的现象,无人不谈文化,无事不关于文化,文化成了包治百病的丹药秘方,被滥用

^① 方汉文:《比较文化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6页。

到极端的地步,此乃最可悲与可笑的现象之一。

以基础教育适应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变迁的要求,并非只是本书的一种倡导,实际上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一种无可选择的方向。文化之变迁,余曾经参考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变化,作出两种变化方式的总结。

第一种是“代变论”,胡应麟《诗薮·内篇》中说:“四言变而《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三百篇》降而《骚》,《骚》降而汉,汉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诗之格以代降也。”文化的变化也相同,表现为形式的取代,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第二种是所谓的“通变”,《文心雕龙·时序》中所提出的文学史观是最早的文学史观念之一,他所主张的“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寄乎时序”,通变是一种时事的变化,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时代相联系而变化。

余赞成通变论,穷则变,变则通,其自易经起源,历代学人多有阐释。

在基础教育中进行人文主义的教化,正合于文明与文化的本义,西方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的原义是农业种植与栽培,含有驯养、调教的意义,“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则与古代城邦之形成有关,城邦建立,与“野蛮”分轸,如果将二者联系起来看,正是人的教化之本义。

余本意是为王海燕博士作序,一气写下,不意竟成一文,卢橘夏熟,玉树青葱,叹出比目,述游海若,假称真怪为润色,前人之未能免也,余何患之乎。然子建好讥,士衡文繁,古人诟病,无可厚非也。愿以为鉴。

襄举盛世,文章昭发,调谐金石,思归风云,未为精核,粗足讽览,与王海燕博士共勉之矣!

2006年4月30日夜于苏州大学鉴竺识存楼

目 录

导论	(1)
一、课题的提出	(1)
二、方法论的思考	(10)
三、研究思路	(25)
第一章 “人文精神”辨	(28)
一、“人文”辨	(28)
二、“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精神”辨	(29)
第二章 中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37)
一、西方文化与人文精神	(38)
二、中国文化与人文精神	(50)
第三章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人文精神的重塑	(69)
一、文化转型的历史境遇分析	(69)
二、文化转型与人文精神的转型	(76)
第四章 人文精神的重塑与语文课程改革	(118)
一、关于“课程”概念的思考	(118)
二、语文课程改革与人文精神的重塑	(122)
三、语文教育课程改革如何塑造新型的人文精神	(136)
结语	(171)
主要参考文献	(174)
后记	(178)

导 论

一、课题的提出

(一)课题提出的背景

本书的背景,主要基于两点。

第一,基于我国社会转型对人格转型的要求。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全面转型时期,转型的内容包括由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伦理型社会向法治型社会转型,等等。

社会的转型要求作为社会主体的国民实现人格的转型,它要求全体国民从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型。人格转型的核心是人的价值系统的转型。而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就是价值系统,因此,要实现人格的转型,就必须探讨现代人应具备的人文精神。

第二,基于教育促进人的发展的要求。

教育的直接目的,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人的发展的内容,总是被特定的文化情境所规定。因此,从文化转型的角度,特别是从人文精神重塑的角度探讨人的发展,是实现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的的时代要求。

第三,基于教育之“以人为本”的终极价值目标。

教育之终极价值目标在于为改善人生服务。

“教育是什么?”这一问题对于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而言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本书认为,教育作为文化,是“为人”的,因而,其终极价值目标,在于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在讨论教育与人生的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什么是教育?什么是人生?教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以为教育应该指学校教育而言。所以教育是把学校作为工具,把旧有的知识系统传授给继起的青年,使他们养成一种适合于既成社会的人格,以维持和发展这个社会。所以教育是人类获得生存资料和经营生活的一种工具。教育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工具。这种工具,大而言之可以挽救国家社会,小而言之可以指导个人,改造个人的错误,实现个人的本能,它的作用是很大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谓‘人生’,系包括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言。各人对于人生的见解,就是所谓‘人生观’。认为人生是快乐的,就是快乐的人生观;认为人生应该献身于国家与社会的,就是责任的人生观。各人的环境不同,着眼点各异,因而各人的人生观亦不一致。学校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因而不能不注意教育与人生的关系。教育与人生的关系,大致有三点:一、以教育认识自己。天下最可怜的事情莫过于自己不认识自己。有的人因为不认识自己的缘故,走入歧途,一切堕落,事业不得成功,甚至危及生命,这是何等的危险。认识自己有两方面:一为自己的主体,或称‘自我’;一为自己的环境……认识自己的本身,最主要的是自己的地位。一个人能否尽自己的责任,就以认识自己的地位与否为先决条件。各个人的地位本来是环境的反映,但是对付这个环境因人而不同,不是机械地受其支配而已。所以对于环境,就有能否适应的分别。所谓适应,既非屈从,又非反抗,乃是恰当利用环境之谓。要利用环境,除了认识环境之外,第一要注意自己所处的地位,第二是自己的能力,第三是自己的能力在所处的地位能够发挥的作用。所以环境的认识 and 自我的认识都是必要的。认识客体的环境和自我主

体的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相当的知识学力,同时要引导学生走入正轨,使其了解世界的大势、本国的情状,以及学生所负的使命和个人所处的地位。二、以教育革新自己。革新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是铲除一切障碍物,如虚荣心、怠惰心,等等。……另一方面是革新过去的错误观念。……三、以教育成就自己。……按照自己的所长和所好去成就自己。……无论缺了哪一件,很难成为健全的分。”^①

叶先生对教育价值的阐释可谓至言矣!教育的起点,乃是尚不理想的人生,教育的终点,乃是理想的人生。教育的直接目的,是要实现人的发展,然而,教育的终极目的,却是要改善尚不够理想的人生。我们之所以需要教育,不过是为了通过自我最充分的发展,获得理想的人生而已。

正因为如此,教育必须关注现有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存,始终是与文化情境分不开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情境,是由社会转型导致的文化转型。因而,从文化转型的需要出发,思考自身的发展问题,从而使自己能够适应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实现教育之终极价值的必然要求。如此,在这个历史时期,人应具备何种人文精神就成为我们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第四,基于本次课程改革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之中的课程改革把价值取向的引导作为重要的课程目标。本次课程改革的总体目标是^②:“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

^①叶圣陶:《教育与人生》,载于《叶圣陶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7~59页。

^②钟启泉、崔允漭、张华主编:“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刍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质教育。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为了实现上述的总体目标,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与策略应该是:第一,倡导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第二,重建新的课程结构。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并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第三,体现课程内容的现代化。……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第四,倡导建构的学习。……第五,形成正确的评价观念。第六,促进课程的民主化与适应性。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是价值系统。因此,从文化转型的角度探讨人文精神与课程改革的互动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

(二)课题的意义

1. 理论意义

第一,探讨新的研究方法。

长期以来,教育研究的方法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过于抽象化。教育研究作为人的实践活动,总是被特定的文化时空所规定。教育问题的提出、解决和应用,必须在特定的文化之中进行。离开了具体的文化情境,教育研究就会呈现出过于抽象的特征。只有立足于具体的文化情境,才能避免提出“伪问题”,找到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有效的解决方法。

二是过于分科化。随着教育研究领域各个分科研究的发展,一方面,教育研究需要展开更多的“合作研究”。比如,近年来,课程概念的“泛化”现象,表达了课程研究急需和其他教育研究领域(比如教学、管理等)合作的趋势。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具备了“合作研究”的基本条件。比如,教育政治学、教育文化学、教育人类学、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等分支学科的纵深发展为“合作研究”提供了基础。

本书尝试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克服教育研究的过度抽象化和过于分科化的问题,从而探索新的教育研究方法。

第二,有助于从理论上解决文化转型对课程改革的影响问题。文化转型下的人格转型,要求从理论上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课程改革如何回应文化转型的特殊需要。本书正是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探讨文化转型和课程改革互动的若干理论问题,从而为新的历史语境下的课程改革找到具体的对策。

2. 实践意义

当前正在进行的课程改革实践,面临着如何适应文化转型的特殊需要的问题。本书的成果,可以被运用到学校课程标准的研制、教材的编写、教学模式的设计等实践问题上。

(三) 研究现状

人文精神在国内基础教育研究领域中是一个热门词,但从文化转型的角度探讨人文精神的问题,却基本上处于空白。其中,在这方面做出比较深入思考的是韩军和曹明海先生。

韩军,在其《韩军与新语文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一书中,对人文精神及其对语文教育改革的意义提出了比较深入的探讨。韩军认为,百年来中国语文教育存在两大“痼疾”,即“伪圣化”和“技术化”。要使语文教育推向前进,就必须消除这两个问题。用新语文教育取而代之。他从反对语文教育的技术化、伪圣化出发,认为语文教育的属性乃是“人文精神”,要倡导人文精神,就要反对伪圣化、技术化。所谓“伪圣化”,就是用一套唯一的“群性话语”“公共思维”模式,钳制师生丰富多元的精神方式、说话方式,压抑精神自由,禁绝个性语言,让全体师生都用一个模式思维、一套话语说话;就是用专制色彩的、伪神圣、假崇高的观点去看待“高尚”“健康”“先进”“有意义”等真正的人文价值范畴,让师生的语言,远离真实的人生和真实的现实生活。伪圣化的表现是:第一,以一元化禁绝多元化的解读。由此,抹煞了人的精神自由。第二,以统一的公共话语代替师生的个性话语。具体表现为,“师生的表达大体都有统一的套子。如,写青松,必先联想先烈;写石子,必先联想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写太阳、春雨,必先联想党的温暖、党的培育、党的政策;写长城,必先联想解放军。……通过上述语文课‘循循善诱’的‘训导’,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当中,连一些基本语汇都成了‘公共’的了,都是亮亮相合的。譬如‘白衣天使’与‘护士、医生’,‘蜡烛、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与‘教师’,‘残酷、黑暗、吃人’与‘资本主义、旧中国、旧社会’,‘光明、温暖’与‘社会主义、新中国、新社会’,等等。在说话、写作中,只有如此这般相连,方才合格,主题才‘积极’,才‘有意义’。……你总是被面命耳提地告知,必须升华,必须昂扬,必须写正面、写光明、写本质,写积极的一面,必须写精神追求,不能写物质追求,不能写消极,不能写阴暗面,等等。当学生时,是老师面命耳提地告诫你;走上社会后,提笔写作或张口说话时,是你自己下意识地告诫自己——这已经成了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慢慢地,学生们写起来就轻车熟路了,再也不敢写自己的真实所见、真实所想。……我们的孩子们被纳入了一个个早已准备好的套子之中。

孩子们的精神、孩子们的个性就是如此泯灭的！我们可以抽查天南地北、城市乡村的学生作文，我们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相当数量的作文，从谋篇布局到词语的选用，甚至开头结尾，都如出一辙。你很难发现很有个性的文章。天南地北、语言方式，有着大体一样的大脑。”第三，伪圣化升华的情结。具体表现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思想等思想政治教育被扭曲，“同真实人的基本生活愿望相对立，与不断发展的人的现实生活相脱节，与真实的人的精神自由、个性自由相背离。也就是说，不少教师对‘高尚、健康、先进、有意义’的理解，对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思想的理解，已经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在几十年极‘左’话语的潜移默化中，打上了极‘左’化、‘伪圣化’，已经成了几十年几代语文教师的耿耿情结。”“伪圣化”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学生上语文课无话可说，二是导致虚伪的两面人格。大家在公共场合和私人场合使用两套不同的话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都不敢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失去了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精神。因而，是束缚人性的。何谓技术化，“就是无视人的精神存在，无视人文涵养、人文积淀、人文价值之于语文教师、之于语文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把语文教育降低为纯粹的技术操作手段。推动它的是‘文以交际’思潮。技术化的表现有：一是把富有文化底蕴的语文教育简化为几课型、几步法、几段式的纯粹程式化的操作。二是把注重感性内化、注重心灵感悟的语文教育，潜意识地理解为纯粹理性的语法学、词汇学、修辞学、写作学、阅读学、文章学等的堆砌。三是高举理性分析大旗大肆操练。不顾及文章内在神韵，进行机械化的所谓阅读训练，进行分子、原子、原子核、质子、种子一样的分析，由篇至段，由段至层次，由层次至句，由句至成分、至词、至字，分解了再分解，一直分解到词根、字根。不顾及人的自我精神与情感，进行程式化的‘八股’般的写作，字法、词法、句法、段法、章法等，层层技术化”。总之，“语文教